

《圣经》历史观及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The Historical Views in the *Bible* and Its Influences on Later Historiography

杨 建 (Yang Jian)

内容摘要：《圣经》被称为“历史文学”、“历史神话”、“神学史学”，呈现出历史、文学、宗教多学科融通特点。《圣经》历史叙事形态多样，风格各异，蕴含着多元神学历史观——民族史观与宗教史观、犹太教圣史观与基督教圣史观、线性历史观与循环历史观、二元论历史观与二分法历史观，是考察古代犹太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以及人类起源和发展史的首要依据。圣经史学这些历史观虽然来源不同、立场不同，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客观存在于《圣经》中，对后世史学、特别是犹太史学和基督教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圣经》；历史观；圣经史学；犹太史学；基督教史学

作者简介：杨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 20 世纪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旧约》向《新约》的文学嬗变研究”【项目编号：11BWW05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Historical Views in the *Bible* and Its Influences on Later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The *Bible* is called Historical Literature, Historical Myth and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 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There are diverse historical narrative genres and styles in the *Bible* that contains multivariate theological historical views, such as national historical view and religious historical view, the Jewish historical view on salvation and that of the Christian, linear historical view and cycle historical view, dualism historical view and dichotomy historical view. It is the primary basis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Jewish people, the histories of ancient Judaism,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lthough these historical views of Biblical Historiography have different sources,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even contradictions or conflicts among them, they objectively exist in the *Bible* and hav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later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the Jewish historiography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Bible*; historical view; Biblical Historiography; Jewish Historiograph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Author: **Yang Ji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research fellow at International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Eastern literature and Eastern aesthetics (Email: yangjian64@163.com).

《圣经》被称为“历史文学”¹、“历史神话”²、“神学史学”³，呈现出历史、文学、宗教多学科融通特点。《圣经》历史叙事形态多样，风格各异，是考察古代犹太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以及人类起源和发展史的首要依据，蕴含着多元神学历史观——民族史观与宗教史观、犹太教圣史观与基督教圣史观、线性历史观与循环历史观、二元论历史观与二分法历史观。圣经史学这些历史观虽然来源不同、立场不同，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客观存在于《圣经》中，对后世史学、特别是犹太史学和基督教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民族史观与宗教史观

“古代以色列人对自身早期历史的叙述多保留在宗教经典希伯来《圣经》（以色列人称之为《塔纳赫》[Tanach]），该书既是我们可以依据的基本文字资料，同时也是古代以色列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经典”（吴晓群 258-259）。正是借助于《旧约》所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勾勒出“上帝的选民”、“宗教的民族”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太古时期——族长时期——摩西时期——士师时期——统一王国时期——分国时期——亡国时期——囚居时期——傀儡政权时期，详细地掌握了古代以色列兴教、建国、立法、分国、亡国、先知运动、宗教改革的历史。总体来看，“希伯来人的历史开始于遥远的传说年代，终止于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以‘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建立及其沦亡为界，这部历史大致可分为王国建立之前、王国时期和王国沦亡之后三个阶段”（朱维之 144）。古代希伯来史学被分为五个阶段：口头传说阶段（王国建立之前）、早期书面实录阶段（王国前期）、申命派史家修史阶段（申

1 参见王立新：《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145-146。

2 参见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8。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5。

3 See Deines, Roland. "Preface", *Acts of God in History: Studies Towards Recovering on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 Eds. Christoph Ochs and Peter Watt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13): XI.

命运动期间)、祭司派史家修史阶段(被掳回归之后)和希伯来史学的尾声(希腊化后期至罗马时期)。¹

《旧约》也是犹太教史学经典,记录了古代犹太教的起源和发展史,追溯到犹太民族始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信仰,详细描绘了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在西奈山创立犹太教、在约旦河东重申上帝诫命以及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发展情况,《旧约》中的古代犹太教历史是神对一个民族历史命运的启示,有很高的宗教史研究价值。

《圣经》中有基督教史学萌芽,《新约》是早期基督教教会史。基督教早期历史是古代犹太教历史的组成部分,二者又都是希腊-罗马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诞生、受洗、传道、领死、复活、升天、初期基督教创立等事迹,基督出现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中心事件。《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升天后初期基督教不断脱离其源头而成为独立宗教的历史:最初由彼得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后来逐渐传遍巴勒斯坦,传到安提阿和小亚细亚,又扩展到欧洲,在哥林多、雅典、罗马等外邦大城中生根开花,蓬勃成长起来。

《新约》作者都是使徒,有的是耶稣门徒,同时代人,直接追随耶稣传教,见证了福音降临的全过程,并在耶稣遇难升天后继续传教,他们记录了耶稣生平事迹及语录教训;有的在世时间稍晚于耶稣时代,如保罗和路加,但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史传文学和书信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保罗是第一个去外邦传播福音的基督徒,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被历史学家公认为对早期基督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保罗书信除了宣扬福音,讨论神学问题,主要内容还包括:1. 解决初代教会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2. 明确教会使命。3. 明确信徒责任和义务。

二、犹太教圣史观与基督教圣史观

《圣经》上帝神学信仰支配下的历史,被称为“信仰的历史”、“神学的历史”、“卓越的圣史”。所谓“圣史”即“救赎的历史”,此概念主要出现在德国神学著作中,德文词为“*Heilgeschichte*”,相应的英文词为“*Salvation History*”,又译“救恩史”或“救赎史”。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圣史观,上帝对历史的预定和掌握是圣史观的基本观念,基督教圣史观对犹太教圣史观有继承,也有创新,两种圣史观的最大区别在于,犹太教圣史观是对于犹太民族的拯救史观,而基督教圣史观是对全体人类的救恩史观。

《旧约》历史记载了上帝的伟大作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者,他创造历史,又推进历史;上帝全知全能,历史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历史取决于上帝的意志,是神意的体现;上帝既是自然的立法者,也是历史的立法者,教诲并引导着众生;上帝介入历史,预定了历史进程和终局。“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1 参见朱维之:《希伯来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51-161。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以赛亚书》46:10）¹。每个时期上帝都与人缔结圣约，《旧约》历史又分成伊甸之约、亚当之约、该隐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雅各之约、西奈之约、迦南之约、大卫之约以及新约。每个时期上帝都有拣选、赏罚、救赎，无论是立疆界、管理万族、国家兴衰、权位更迭、立王废王，还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计划之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400 年、“巴比伦之囚”持续 50 年、依次出现四大帝国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上帝的意志和安排。上帝与子民同在，云柱、火柱、会幕、圣殿、圣城都是他与百姓同在的标志。还有“君权神授”、“有限君权”、“亚卫大于王”观念，“神政”观念，“圣战”观念，选民观，弥赛亚观，等等。“在希伯来‘王权意识形态’中，唯有雅卫才是以色列真正的主宰，而君王只是上帝谦卑的仆人”（张倩红等 35）；“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46:10）。“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诗篇》22:27-28）。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历史是上帝意志的彰显与干预和上帝惩罚与救赎的过程。在这种神定论基调下，犹太人把他们的历史视为上帝与其子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记录，是一种集体记忆和经验。

基督教在继承《旧约》时也继承了犹太教圣史观。在《新约》中，上帝与人的同在和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救赎的历史进入最高潮。但对于基督教来说，耶稣被理解成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上帝藉着“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14）的耶稣基督直接进入历史，使神的儿子与人同在，照亮世界，在时间、空间、人群中活生生地向人显出真理和生命的真谛来，耶稣荣耀的死、复活和升天，为世人成就了救恩。“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耶稣必快来，象征着永恒生命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人类的历史已事先被上帝决定，而且很有可能在创世时就已决定。

上帝还通过历史自我启示。历史成为一个舞台，表现上帝的特性和刻画上帝性格的行动。这位神祇不断介入人类事物，透过不同形式向人说话，藉先知、使徒、梦境、异象、自然界、历史事件、超自然神迹向人显明、预言、启示。“他们的神——古代以色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介入人类历史、按他自己的计划为人类安排各种事件的神。在此过程中，他既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又向子民启示了自身。《圣经》的作者们并不抽象地诠释这位神祇，而是通过描述他千百年中与子民以色列交往所做的行动，说明他过

1 本文对《圣经》的引用均出自《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新国际版，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7 年，下文只在引文后注明卷名和章节，不再一一说明。

去如何，现在又怎样”（弗莱，《批评的解剖》44）。有人认为，《圣经》是一部犹太民族传记，也是一部关乎上帝的传记，甚至是一部人类历史文化的传记¹。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有一个美好的开端，但人类始祖堕落了，被逐出伊甸园，世界开始了漫长的败坏与拯救过程，形成了救赎史，直到《启示录》中出现“新天新地”。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和基督对全人类的救赎贯穿圣史始终，从《旧约》到《新约》，人类的悖逆败坏始终不断，而上帝的爱意与救恩也一直伴随以色列和世人左右。弗莱用“U”型结构描述了这一救恩史的总体框架，赞颂耶稣救恩的伟大：

他通过道成肉身进入了物质世界。在十字架上殉难后，在下层世界战胜了死亡与地狱，而且，根据后来的传奇，“征服了地狱”，并在地狱的边境救出了那些应该得救的灵魂，其中包括亚当、夏娃直到施洗者约翰。然后，正如已经证明的，他在复活的日子又出现在物质世界，并升天回到天上。（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227）

来肯在《认识〈圣经〉文学》一书中指出：

整部《圣经》故事的主要进展元素是上帝贯穿整个历史的不变目标。《圣经》学者把它称为“救恩历史”——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将人从罪恶和罪恶的永远后果中救离出来。《圣经》故事是关于上帝在历史上、自然中和人们生命里的作为的记录。因为上帝的意志构成了行动的本质，所以《圣经》中最重要的故事可以被称为：上帝的救赎行为下的人类历史，他定意审判世界的罪恶，并将人救赎出来。（199）

《圣经》的历史是上帝“救恩历史”。在上帝救恩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创造之主权、创造之恩典、创造之眷顾、创造之维系和对人类创造、抚育、圣化的悠长过程。中外学者在比较《圣经》历史记载与古代埃及、西亚诸国、希腊历史记载的不同以及民族历史意识的差异基础上，把

1 别尔嘉耶夫认为，“圣经正是圣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别的东西。因此，圣传一旦被否定，圣经也必然被否定。……不仅有教会上的圣传，而且有历史的圣传，文化的圣传，即神圣的内在传统。”参见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6、7。

以色列民族历史观从根本上概括为是一种一神论的“神权历史观”¹，得出以色列民族历史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史这一重要结论，并认识到：

这种独特的历史观与以希腊、罗马史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众所周知，希伯来《圣经》后来被新兴的基督教接受为《旧约》，《新约》其实在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念，《旧约》和《新约》共同构成的基督教《圣经》对中世纪西方史观的形成、史学的发展又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王立新、王敦书 96-97）

古罗马时期犹太史学家弗拉维斯·约瑟夫的历史书写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神意的表达，中世纪史学“总是以神学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总体的解释”（赵立行 1）²，“犹太人的历史通常被犹太学者和拉比解释为神意支配的历史，对犹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都被打上了强烈的宗教烙印”（张倩红等 8），“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犹太编年史基本上延续古代犹太人的观念，把历史理解为神启的产物，继续期待末日救赎的到来”（张倩红等 19）。

三、线性历史观与循环历史观

历史离不开时间，历史演变和历史书写都会呈现出历史中人及后世史家的时间观。许多名家谈到历史与时间、史学与时间的关系问题。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认为，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也说过，史学是时间的科学。现代史学不管以何种体例书写历史，基本上都是按照历时发展线索编撰的，普遍采用线性时间观，时间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在这条时间轴线上起起落落、或生或灭。世界各地曾经使用过各种纪年法记载历史，包括以耶稣诞生为公历元年计算此前和此后年代的方法——基督教纪年方法，都可以放置或折换到线性时序中去。在世界史编纂史上，基督教史家“这种以时间序列来构建过去的努力，代表着基督教以自我为中心自觉地构建历史的开端”（赵立行 5）。

主导欧洲中世纪以及西方现代史学的线性历史观与基督教早期经典《圣经》中的历史观及古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教父哲学重要代表人物、“历史哲

1 参见王立新、王敦书：《试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形成》，《史学月刊》2（2001）。张倩红等：《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35。Robert Karl Gnuse, “Holly History in the Hebrew Scriptures and the Ancient World: Beyond the present debate,”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Vol.17(1987): 127-136.

2 参见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 chapter 1.

学之父”、欧洲中世纪神学史观的奠基人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有直接联系。

《圣经》最初的作者或编撰者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非常关注历史与时间关系问题，这也是后世《圣经》研究、特别是《圣经》神学与史学研究首先关注的问题。《圣经》书写的历史有始有终，都发生在这条时间轴线上：创造、堕落、出埃及、征服迦南、以色列立国、被掳、回归、耶稣的诞生、教导、救恩、使徒传教、基督教会成立等等，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现存世界在末日全部终结，历史循着上帝所预定的方向发展，走向人类的终极归宿，复活永生于天国。此外，《圣经》按照年月日编撰历史事件，《旧约》中大量的族谱、家谱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新约》中耶稣家谱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都意味着《圣经》建立的是不可逆的、向上发展的、指向未来的、合乎神意的线性历史观。犹太现代史学家阿巴·埃班盛赞：

这种历史观是犹太人遗产中的最重要部分，……它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革命的思想。从前，没有哪个民族把人类命运想象成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循环，想象成不受生老病死这个无情规律制约的过程；人类可以摆脱强制的，即天命的奴仆身分，人类是一种理性的、敢于冒险去进行选择生物。（106）

别尔嘉耶夫也高度肯定道：“历史的思想是被犹太人引进世界历史的，我并且认为，犹太民族的主要使命就在于，把历史之完成的思想带进人类精神的历史，以此区别希腊意识提出的过程乃为循环的观点。古代犹太意识总是把这一历史过程与救主降临说即末世论思想联系起来考虑”（22）。弗莱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第五章中把《圣经》故事分成创造、斗争、律法、智慧、预言、福音和天启七个启示阶段，其中五个阶段主要在《旧约》，两个阶段在《新约》，利兰·来肯在《圣经文学导论》“导言”中对于《圣经》叙述时间和事件的描述，因循的也是线性历史观。

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神学历史观，或称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是奥古斯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古斯丁从神学意义上界定时间，“为以圣经的历史为核心把世俗历史纳入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中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立行3）。他区分了两种历史观：一是希腊—罗马的循环历史观（the cyclical view），二是犹太—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the linear view），贬低前者，肯定后者，选择性地继承了犹太—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基本观点：犹太—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不同于自然历史观，它建立在上帝神学信仰基础上，是信仰的历史观。上帝创造了时间，也创造了历史；现存的历史有一个开端，也有一个终结，它始于上帝创世，终于末日审判，起点与终点之间是人的堕落和上帝救赎的历史；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所有民族无一

例外地都加入这一行进过程。奥古斯丁是一个过渡性人物，确立了基督教世界史观，在历史时间、历史发展、历史学的性质与目的等方面，为中世纪史学定下基调，中世纪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以编年史为主，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多从《创世记》开始写起，终于中世纪史家所处年代。犹太－基督教线性历史观被西方史学界普遍接受。

然而，人类学家发现，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历史观都是循环历史观，即历史循环、永恒轮回的观念，包括自然循环和社会循环两个方面。这种古老原始的时间取向主要基于原始初民们对自然现象的深度观察（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对生产周期（如春种秋收）的熟练掌握以及对人类历史（如王朝更替）的整体感悟。《圣经》概莫能外，虽然主导倾向是线性历史观，但也存在着古老的循环历史观，并直接受到了古希腊－罗马历史循环论¹的影响。

先知以犹太民族为中心观察历史，历史对于先知来说是由订立圣约的过去、违约的现实和践约的未来构成的，现实充满灾难，为了给现实的人以希望，他们极力展望美好的未来，使未来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二者仅以现在时和将来时加以区别，先知预言的结束，准确地说并不是指时间的结束，而是罪恶历史的结束，“主的日子”就是令人丧胆的灾难降临到不忠实的异教徒和犹太人头上的日子，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国度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以色列新的历史的开端。

《传道书》中这段话非常有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1:4-7）。解经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传道书》受古希腊哲学中存在循环论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存在循环论以对自然界的观察为依据，揭示了存在之永恒性，永动变化的是现象，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的是存在，即规律。斯多噶学派宣扬历史循环论，万物都在一个大循环中周而复始。该学说与犹太民族与生俱来的命定思想结合起来，给本来就虚无悲观的《传道书》抹上一层深重的宿命论色彩。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大洪水取消了创世，使世界回到混沌状态，而上帝是一个好吃后悔药的神，世界发生了无数次创造和毁灭的循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次次毁灭，意味着一次次更新、恢复、重来，循环往复，永无止息。以色列人的犯罪——受罚——悔罪——得救的四部曲也带有历史循环思想。“它与‘文献先知’的历史观也是一致的。这一模式成为一条隐匿于整个古代以色列民族史叙述之中的逻辑线索”（王立新248）。此外，《圣经》中还有许多宗教节日，这些节日年年进行，也形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不断重复的循环历史观。

1 例如恩培多克勒认为，宇宙就在创造与毁灭两个阶段之间摆动；柏拉图认为，每一次大洪水都使人类的一切重新开始；亚里斯多德认为，在许多方面，未来将与现在相同，人类的一切事情以及一切其他具有自然运动和生灭过程的事物的现象都是一个循环。

在《圣经》中是否有历史循环论这个问题上，奥古斯丁持否定态度，在《上帝之城》中，他以嘲弄的语气讽刺柏拉图、马克洛庇、奥利金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这种观点。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继续秉持着奥古斯丁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佩特拉克、马基雅维里和启蒙主义时期的维科等向奥古斯丁提出了挑战，将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进一步理论化。而现代《圣经》学者既因循线性历史观，也不否定《圣经》中的历史循环观，认为这两种历史观都能解说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例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谈到了《圣经》存在着巨大环状过程和循环运动：

从总体来说，《圣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巨大环状过程，在此过程中，弥赛亚经过了由道成肉身（incarnation）直到羽化成仙、受世人崇拜的英勇历程。这一过程中，还明确或隐约地包含着三种其它的循环运动：就个人而言，由诞生直到获得拯救；就性生活讲，由亚当与夏娃的结合发展到《启示录》中的婚礼；就社会过程讲，从宣布十诫到建立法治王国，即《旧约》中重建的耶路撒冷和《新约》中的千年王国。（472）

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他又谈到《圣经》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历史轮回隐含着历史循环论思想：

在圣经历史的中间看起来是有一个轮回的运动。用格雷夫斯的话来说，这个轮回运动是“从方舟到方舟”。……挪亚方舟在淹没世界的洪水中漂流，然后停泊在一座山顶。它作为新世界的一颗巨大的种子，装载着全部未来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完成了人类存在的第一次大轮回。第二次轮回规模小一些，这次轮回从幼儿摩西被藏在一个柜子里，躲过了希伯来儿童所遭受的灾祸开始，以色列人在追赶的敌人葬身海底之后，带着神圣的柜子穿过他们到达的陆地，最后把柜子带到耶路撒冷，在象征的意义上停放在世界的最高点，正像挪亚方舟先前停在山顶上一样。（230）

他还谈到，“法老的梦想是一次丰收与饥荒交替出现的七年轮回，它和近东地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的七年轮回相联系，也反映在《利未记》（25）有关‘禧年’的戒律中”（229）。弗莱揭示了《圣经》中存在着一个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巨大环状过程。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帝国的权力轮回，但最后终结于上帝所建立的永恒的弥赛亚王国。而“在《福音书》中，重点自然是放在所有轮回运动的结束，以及启示的世界和恶魔的世界的最终分离。尽管如此，一个新的历史轮回正在开始，虽然《新约》本身认为这个轮回只

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延续到第二次降临，而且假定它的延续就时间来说是很短的”（229）。

四、二元论的历史观与二分法的历史观

在《旧约》中，上帝是惟一的真神，魔鬼作为恶（邪灵）虽已存在，但并未形成一种足以与上帝抗衡的敌对势力，在同一层面构成二元对立关系。不过，第二圣殿时期的某些犹太教派别“在解释邪恶取胜的问题时，假定有许多超自然的存在，他们反对上帝的统治以及真善的所有一切。每个人灵魂内的善恶斗争都映射出宇宙中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的斗争。这些设想中的二元论色彩如此浓重，以至于它们能否被称为一神论（表达对独一神上帝的信仰）都需要讨论”（Cohen 10）。至两约之间的启示文学中，撒但在这个在《旧约》中很少提到的具有叛逆性的天使已发展为《以诺一书》（40:7）、《禧年书》（11:5；17:16）、《摩西升天记》（17）等作品中与上帝相对立的彼列、玛斯塔玛和撒玛亚等恶的化身。《死海古卷》中把它视为邪恶势力的祸首和公义的敌人。到《新约》、尤其是启示文学中，以撒但为首的邪恶势力非常强大，发展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掌握死权，与上帝和天使团形成根本对立，宇宙间充满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和矛盾斗争。启示文学的艺术思维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神话思维模式，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和神话与现实相糅合的叙事模式：光明与黑暗、代表“善”的真神与代表“恶”的撒但、真理的灵与悖逆的灵、天使与魔鬼、充满罪恶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中的弥赛亚国度、现世与来世、新耶路撒冷与罪恶的大城、人类历史与新天新地、有限的罪恶人生与超自然的复活永生、绝望与希望、灾难与福音、不幸与胜利的对立，世界就是善与恶搏斗的战场。这就是《圣经》启示文学中二元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完全来自于波斯的祆教”（冈田英弘 47）。

启示学者进一步跳出以色列民族历史阈限，放眼整个世界，并将人类现实与未来的对比推向极致，让现实断裂于未来的门槛上，形成现世与来世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耶稣再临，统治世界千年，之后便是末日来临，时间终止，世界毁灭，历史终结，善最终战胜了恶。“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21:1）。“《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是历史的断裂与终结，是超越于历史的‘从天而降’的另一个神话的开始”（赵宁 172）。天启思想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两个世代”的教义和历史观：现今充满邪恶、痛苦的世代，要被基督的世代所替代，形成二分法历史观。沦落在魔鬼撒但等敌对势力之手的黑暗现实只有彻底终结以后，一个属于神的国度、美好的“新天新地”才会从天而降。前者是“现存的世代”（the present age），后者是“降临的世代”（the age to come）和“蒙恩的时代”，二者的分界线即末日审判，这是“现存的世代”的终点，也是“降临的世代”的开始，造成今世与来世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质的一分为二。正是这种

今世与来世的绝然对立，造成了启示学者不同于先知线性历史观的所谓二分法的历史观。

“两个世代”的观念源于《旧约》，但又有不同。大卫曾为自己的国民代祷：“耶和華啊，你必保護他們，你必保佑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詩篇》12:7）。“這世代”即罪惡的現世，這裡惡人當道，步步高升，到處遊行。“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該去哪兒呢？大衛描述了世人心中的嚮往：“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着你說的”（《詩篇》87:3）。“有一道河，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詩篇》46:4-5）。“耶和華本為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他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我們在萬軍之耶和華的城中，就是我們神的城中所看見的，正如我們所聽見的。神必堅立這城，直到永遠！”（《詩篇》48:1-2，8）。《舊約》中的先知末世論和啟示末世論也描述了上帝應許、永遠堅立、必不敗壞的以色列國及聖城耶路撒冷，寄托了人們的現實祈望和神性嚮往——與神同在的神聖居所“上帝之城”是永恒不灭的存在。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3:14），无始无终，在時間上無限，在空間上也無限，超然於他所創造的有限時空和有限歷史之上。《新約》繼承了《舊約》中的時間永恒觀、復活觀以及兩個世代的觀念，但更強調來世復活，今世和來世已在末日審判那天發生了斷裂。猶太人的兩世觀深深影響了保羅。賴德說：“保羅的神學思想是以揭示今世與來世已顯明的二元論架構。但這不是保羅的創新用法。第一世紀的猶太教已留下這種思想的模式。……保羅卻以基督徒的角度，對這二時代二元論的意義，做了基本的修正”（661）。保羅專門談到了基督死而復活的意义：“既從死里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羅馬書》6:9）。《新約》中的來世和復活思想指向的是“和主永遠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4:17）的永恒的天國。

在傳世名作《懺悔錄》和《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談到上帝所創造的有限的短暫時間與上帝自身無限的永恒時間之間的差別，永恒的上帝創造了時間，但超越於時間，“千年如一日”¹，不朽不灭。時間發端於永恒上帝的創世決定，末日審判的意義之一在於復活，人類在最後瞬間進入永恒。時間出自永恒，歸於永恒。奧古斯丁也談到了“二分法”的歷史觀。《上帝之城》描述了兩個國度，即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前者是上帝的天國，象徵精神、光明、善良，後者是由亞當的兒子該隱創造的，是肉欲、黑暗、邪惡的代表，整個世界歷史變成了神聖的和世俗的兩種，是善與惡鬥爭的歷史，即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鬥爭的歷史，也是教會統治取代世俗政權統治的歷史。因為教會是連接這兩座城的橋梁，它作為上帝之城在人間的代表，目的便是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間實現，人類歷史終極目標就是到達上帝之城，這是一種直線

1 《聖經》中有“一天如千年”的比喻，如“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同夜間的一更”（《詩篇》90:4），“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後書》3:8）。

上升的、乐观主义的、目的论史观。奥古斯丁以新柏拉图主义¹论证基督教教义，区分了《圣经》中的“两个世代”——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指出“上帝之城”说法源于《圣经》。“圣经为我们所谈论的上帝之城提供了见证，其神圣的权威性超过一切民族的经书”（奥古斯丁 443）。

在充满神秘主义、经院哲学、僧侣理想的基督教神学史观指导下，中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家致力于把奥古斯丁的两城学说付诸构筑世界历史的实践，中世纪史学充满神话和奇迹，强调历史事件与神意的契合，以及基于《圣经》史学的古代教父史学传统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工具。

Works Cited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Augustinus, Aurelius. *The City of God*. Vol.1.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Berdyaev, Nicolas.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rans. Zhang Yaping.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2002.]

Cohen, Shaye J. D. *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Third E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s Press, 2014.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Eban, Abba. *The History of Jewish*.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6.]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Trans. Chen Hui, Yuan Xianjun and Wu Weiren. Rev. Wu Chizhe. Tianjing: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The Great Code: Bible and Literature*. Trans. Hao Zhenyi, Fan Zhenguo and He Chengzho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陈心慧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

[Hidehiro, Okada. *The Birth of World History: The Meaning of the Civilization of Mongol Empire*. Trans. Chen Xinhui.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and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里兰德·来肯：《认识〈圣经〉文学》，李一为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 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这种神圣之光，但最接近上帝的光芒的，还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才能与神秘与伟大合二为一。

- [Ryken, Leland.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Trans. Li Yiwei.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赖德：《新约神学》（上），马可人、杨淑莲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8年。
- [Ryder.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1 Trans. Ma Keren and Yang Shulian. Taibei: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Publishing House, 1998.]
-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Wang Lixin. *Research on Ancient Israeli historical documents, 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historical view*.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王立新、王敦书：“试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形成”，《史学月刊》2（2001）：88-97。
- [Wang Lixin, Wang Dunshu. “On the Historical Outlook of Ancient Israeli People: from the Structure of Sources,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to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Outlook.”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2 (2001):88-97.]
- 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 古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Wu Xiaqun. *A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Vol.2. In *Ancient Tim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张倩红等：《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Zhang Qianhong, et al. *The New Dimensions of Jewish History Studi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Zhao Lixing. *A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Vol.3. Medieval Period.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赵宁：《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 [Zhao Ning.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n Prophets and Revelation Literature*. Beijing: Religion Culture Press, 2004.]
- 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Zhu Weizhi, ed. *Hebrew Cultur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责任编辑：张连桥